

## 现当代文学研究

## 理想主义知识青年的时代困局

——读叶圣陶小说《英文教授》兼及《倪焕之》

李培艳

**摘要：**叶圣陶创作于1928年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以小说的形式回应了彼时新青年群体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时代课题，完整地呈现了时代巨变与知识青年的心灵变迁，但因小说后半部分对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话题的描写“流于空泛的疏说”而备受争议与批评。他1936年发表的甚少为研究者关注的短篇小说《英文教授》承接这一话题，在“五四”到“大革命”的大历史变迁中，追溯了哈佛大学哲学毕业生董无垢因大革命的失败而精神崩溃、幻灭迷失，从一个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新知识精英转变为佛教徒的精神历程。相较《倪焕之》，短篇小说《英文教授》以更为细腻丰满的心理描写深入主人公精神结构的内部，为反思理想主义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所遭遇的时代困局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面向。

**关键词：**大革命；知识青年；精神危机；佛学

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25.04.00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现代中国教育界有着深切了解的叶圣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教育小说。在“五卅”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叶圣陶开始“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sup>①</sup>，笔墨触及理想主义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时代悲剧与精神危机问题。写作于1928年的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可谓其中的代表。然而，小说《倪焕之》因“前后部分情节的脱节和叙述节奏的不一致”，特别是对大革命时期倪焕之的书写不如前半部分血肉丰满而备

受争议与批评。<sup>②</sup>实际上，对于倪焕之等新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所遭遇的时代困局，叶圣陶

① 唐弢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节录）》，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77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② 见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9年第8卷第20号；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371-37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钱杏邨：《关于〈倪焕之〉问题》，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39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此后在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英文教授》<sup>①</sup>中有进一步展开。

短篇小说《英文教授》主要讲述了从“五四”到“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品性纯粹、专心学术且对学生负责的“圣人”般的心理学教授董无垢,积极参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目睹五卅惨案,因大革命的失败而精神崩溃、幻灭迷失,最终转变为到宗教中去寻求心灵安慰的佛教徒的精神历程。相较“流于空泛的疏说”<sup>②</sup>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英文教授》以更为细腻丰满的心理描写深入主人公精神结构的内部,清晰地呈现了从“五四”到“五卅”的大历史变迁中,知识群体内在主体状态的变迁及其所遭遇的时代危机的本质。借用夏志清的话说,《英文教授》“把《倪焕之》里头悲剧含义的精华表现出来”<sup>③</sup>。然而,短篇小说《英文教授》却甚少被研究者关注。本文计划从小说《英文教授》主人公董无垢的形象变迁入手,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追溯其从“五四”到“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主体状态与内在精神结构的变迁,在与长篇小说《倪焕之》后半部分的“互文”性阅读中,反思大革命时期理想主义青年所遭遇的时代危机。

## 一、从西化知识精英到“和尚”式英文教授

小说《英文教授》以主人公董无垢前后个人形象的戏剧性变化展开故事叙述。董无垢最初从哈佛留学归来时,人如其名,身心清白无垢像个“圣人”,小说中这样描写道:“那时候他年轻,无论走到哪里,人家总觉得他带来一股青春的光辉。西服笔挺,应合着时行和时令。一头头发,销磨半点二十分钟不在乎,总之要教它成为一件惬意贵当的艺术品,能以参加美容术的赛会。”<sup>④</sup>最初的董无垢青春焕发,注重个人形象,服饰与发型考究。而且,不同于叶圣陶以往教育小说中塑造的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形象,董无垢有着纯粹的教育理念与严谨负责的专业精神,颇有以教育为“志业”的现代职业意识。“他在大学教课,本着他的素习,预备绝不马虎,讲解非常认真”“不象那些

出门不认货的大学教授,他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移植到学生的头脑里,让它深深地生根”<sup>⑤</sup>。在个人婚姻上,董无垢追求“精神共同体”式的“五四”爱情理想,希望有一个志同道合且“知识程度要能够同他谈谈哲学上的问题”的“另外的半个”<sup>⑥</sup>。在个人生活方式上,他热衷于享受都市化的娱乐与休闲方式,日常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是“和一班年龄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大世界那些地方去”<sup>⑦</sup>,那都是旧上海最为繁华的娱乐场所。<sup>⑧</sup>

由小说中的时间线索推测,董无垢应该隶属于出生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1910年前后赴美至“五四”前后归国的留美学人群体。据学者叶维丽研究,这批“20世纪初到美国学习而逐步转变为‘现代’中国人的留学生,是站在中国与西方接触最前沿的人”,他们崇尚专业化,构成了“中国专业人士的骨干”,是“中国的新知识阶层”,引入了“新的社会习俗、新型的人际关系”,以及包含“‘现代性’(Modernity)关键要素的新的生活方式”<sup>⑨</sup>。由叶圣陶简短的描述来看,董无垢无疑是隶属于这一群体的西化知识精英。他在哈佛大学受过哲学教育,秉持

① 短篇小说《英文教授》发表于1936年7月,初载于开明书店初版的《十年——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署名圣陶,后收入小说集《四三集》。

② 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37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③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81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④⑤⑥⑦ 叶圣陶著,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三卷,第387、387-388、388、388页,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⑧ “新世界”与“大世界”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上海租界出现的著名娱乐场所。其中,新世界于1915年建成,内有多间剧场,还有商场,兼营茶室等,除设有评书、大鼓、相声、杂耍等传统曲艺节目外,还辟有商场、影院、弹子房、跑冰场、茶室等配套设施,可谓中西合璧的游乐场所。大世界则是与新世界相互竞争的另一重要娱乐场所,号称“中国第一俱乐部”。

⑨ [美]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引言》,周子平译,第1-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意识与职业精神,相信知识的教育与启蒙价值,追求“五四”式的爱情理想,热衷于享受都市化的娱乐与休闲方式。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董无垢的存在都颇具“现代”色彩,他为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的是青春的光辉与新生的力量。然而,董无垢的人生却并未沿着成为“中国专业人士的骨干”的路径走下去。在小说的开篇,他却是以一种与西化知识精英判然有别的文化形象进入读者视野的,其非但没有任何新知识精英的“现代”气质,反而是学生们眼中颇为滑稽的“和尚”式英文教授。对于董无垢的个人形象,小说中这样描写道:

头发修得短短地,是“和尚头”,不是“圆顶”,太阳穴的部分错杂着一簇一簇的白发。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称,前胸后背以及胛窝下都有很大的折皱,又太短了,裤管露出了两三寸。鞋是布制的,黑布面,蓝布底,沾上了灰尘,象一个店司所穿的鞋。<sup>①</sup>

相较于八九年前归国时笼罩着“青春”与“现代”光芒的西化知识精英,现在的董无垢打扮得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没有西式头、笔挺的西装与锃亮的皮鞋,整个人看起来衰老、邈邈,简直像个和尚,其个人形象与英文教授的社会身份之间形成了一种颇为滑稽的戏剧化张力。而且,在个人形象的巨大转变之外,董无垢的整个生活方式也由颇具“现代性”要素的都市新生活转变为佛教徒式的持戒修行生活。他将磕头、诵经作为每日的例行功课:

每天上午八点半,他自己的功课开始了。

西墙下的桌子上,香炉里烧着檀香,乳白色的烟缕时而屈曲时而笔直地升起来。一个棕制的蒲团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里念着什么。那是无声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听得见。然后拜下去,整个身躯象青蛙一般伏在蒲团上,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抬起头。他的动作非常熟练,犹如一个从小受了戒的和尚。<sup>②</sup>

在叶圣陶颇具讽刺意味的笔下,董无垢“犹如一个从小受了戒的和尚”,每日自行功课,虔诚地上香、礼佛、诵经、静坐与冥想,沉浸于麻醉似的境界。由小说中的描述来看,他所修习的应该是净土宗。净土宗是汉传佛教十宗之一,根源于大乘佛教信仰,是专修“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之法门而得名的一个宗派,董无垢每日诵读的《阿弥陀经》就是净土宗的三大经典之一。<sup>③</sup>通常的佛教经典讲述的是修心之法,而《阿弥陀经》主要讲述的是极乐世界的详细情况,被认为是通往极乐世界的“指南针”。净土宗以念佛名为主要方法,希望借着弥陀本愿的他力使修习者往生于西方极乐净土。通过修习净土宗,以在意念中创造“极乐净土”的方式,董无垢从当下的学校生活以及一切尘世的痛苦与记忆中抽离,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与愉悦,近乎麻醉似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而且,与当初那个无论走到哪里都让人觉得“带来一股青春的光辉”的大学教授相比,“和尚”式的英文教授在生活中是完全没有存在感的,“差不多和这个世界脱离了关系”<sup>④</sup>。在小说故事的叙述脉络里,在经历失业、母亲与妻子的过世等人生大变故,皈依佛法的董无垢重回大学校园之后,选择了学校东北角最僻静的房间做宿舍,隔壁是植物标本储藏室,“除了一年级的学生,还有一个职司打扫的校工,一个给他送素菜的厨役以外,谁也不会意识到他的存在。他的房门老是关得紧紧地,只有一棵冬青树从玻璃窗间窥看他,熟悉他在房间里的生活”<sup>⑤</sup>。可以说,董无垢是以近乎社会性死亡的方式存在于大学体制内的。对于他的这种存在状态,叶圣陶在小说中还用了一句蕴含着某种古怪的批评张力的语言描写道:“他蜷伏在大学的每一个角落象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见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sup>⑥</sup>以地板下的老鼠为喻,社会性的死亡使董无垢几乎已经物化为环境的一部分。

①②④⑤⑥ 叶圣陶著,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三卷,第383、381、402、380-381、387页,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③ 《阿弥陀经》,佛教经典,亦称《小无量寿经》,简称《小经》,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

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如何生存越来越说明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因为‘越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活法)也就越与他的身份塑造和再塑造密切相关’”<sup>①</sup>。从对世俗人生积极参与的西化知识精英到无欲无求的“和尚”似的英文教授,究其本质,巨大的个人形象与生活方式变迁背后,是董无垢得以立身的文化根基与人生态度的改变,其思想观念似乎经历了某种从“西方”向“东方”的转变。

对于东西方文化及人生态度的差异,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初写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曾提出过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依据满足欲望的不同方式,他将西方文化以及以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划分为三种不同的路向:第一种为西方人的路向,以意欲向前、追求欲望满足的西方文化为基础;第二种为中国人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以意欲的调和应付问题;第三种为印度人的路向,遇到问题时主张从根本上取消问题,对于种种欲望持禁欲态度。<sup>②</sup>与此相应,梁漱溟还提出过三种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是“逐求”,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各种欲望的驱使对金钱、名利、知识等的追求,在梁漱溟看来,近代西洋人将这种人生态度发挥到了极致;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厌离”,即人在面对世俗欲望的纠缠时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对于这一人生态度,最能发挥到家的是印度人,最通透者是佛家;第三种人生态度是“郑重”,即反对欲望的牵引,教人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中国的儒家可谓代表。<sup>③</sup>

比照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和“三种人生态度”,从西化知识精英到东方佛教徒,董无垢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近乎从“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向取消问题而“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东方文化(印度人与佛家)的转变。<sup>④</sup>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其从追求知识与世俗欲望满足的西方人的路向转向禁欲的、“厌离人世”的宗教道路。伴随着主体得以立身的文化根基的改变,皈依佛法在消解董无垢个人痛苦与记忆的同时,也消解了其所秉持的专业精神与知识信仰。在小说的开篇,有

着哈佛大学哲学教育背景的董无垢在重返大学讲台时,劈口就回绝了院长分配的西洋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几个科目的任课邀请,专门选择了可以“免去价值判断”的英文语言课。因为,在他看来,相对东方的佛法,西洋哲学、心理学与伦理学“好比照在池塘上的月光,印在墙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缭乱,实际却空无所有”。<sup>⑤</sup>从西化知识精英到“和尚”式的英文教授,董无垢从崇尚专业化的新知识阶层的骨干变为内在的虚无主义者,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七八年时间内使其个人形象、生活方式乃至根本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如此颠覆性的改变?这就需要回到小说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深入大革命失败前后董无垢主体精神结构的内部寻找答案。

## 二、大革命的失败与信仰本能的发生

董无垢这一根本性的身份认同变化起因于其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身心重创。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前,作为“五四”新知识阶层一员的董无垢正平静而满足地享受着“宛如一道流动不息的小溪”<sup>⑥</sup>般幸福的新婚生活。然而,同1920年代中期大批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一样,火山爆发式的五卅惨案唤醒了董无垢的爱国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在激烈的时代巨变面前,他深受触动,第一时间拿起笔,以“公理”与“强权”抗议违背人性的残杀,联合学校师生支持工人罢工,在参与群众运动的同时,他还“搜集许多流行的关于政治经济的书籍杂志”来研究时局,甚至“加入了当时还不能公开的一个政治团体”。五卅运动中积极的政治参与不仅改变了董无垢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其主体状态,他告

① [美]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引言》,周子平译,第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②④ 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③ 参见梁漱溟:《三种人生态度》,《语文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5期。

⑤⑥ 叶圣陶著,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三卷,第379、390页,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别了曾经所热衷的都市化的休闲与娱乐生活,积极投身民众运动,以胜似亲兄弟般的情义迎接秘密政治团体的成员,将工人、商店公司的职员、小学教师等当成“意志相同的伙伴”。<sup>①</sup>

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以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与国民党的大力动员为基础,知识青年大规模激进化,纷纷南下广州投身国民革命运动,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1926年,北伐战争拉开序幕,激发了知识青年新的政治热情。在这一新的政治局面的鼓舞之下,董无垢一方面密切地关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心神随着北伐军的路线在地图上活跃,“仿佛坐着急行的火车”;另一方面积极地奔走上海的武装暴动和群众运动中,“宛如掉在一个热闹而多变化的梦里”“挤在汗臭满身的人群中间,参加了好些个盛大的集会”。秉持革命理想主义的董无垢单纯地以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已经动摇,“新中国”诞生的时代远景近在眼前,人们很快将在没有压迫、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过上健康、结实、乐观的新生活。<sup>②</sup>

然而,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如晴天霹雳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时代疾行的列车戛然而止。1947年4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最先响应革命、支持北伐的知识青年受到身心重创。董无垢同样难以幸免,没有心理与情感的过渡,从高亢而纯粹的理想主义瞬间跌入激烈而残酷的现实。面对死伤的群众以及“胜似亲兄弟”的政治伙伴们的“肚肠从腰间淌出来……血肉模糊中伸出几根断了的肋骨”<sup>③</sup>的惨烈状态,他遭受剧烈的精神、情感重创,像是从时代疾行的高速列车上跌落,混乱,绝望,颓废,在难以承担的乌托邦失败的创伤中逐渐迷失方向。对于董无垢大革命失败后的精神状态,小说中这样描写道:

他头脑里空空洞洞的,从前装过的许多东西,仿佛生了翅膀飞走得干干净净。他宛如从海船上掉到海里的孤客,海船早已飞快地往前走了,他生命固然还存在,但四围只见茫茫的大海,不知道该往哪方

面游去才有登岸的希望。他昏乱,他疲倦,他喝着多量的酒,可是昏乱和疲倦更见厉害。他夫人很为他忧愁,用种种的柔情蜜意给他抚慰,然而没有效果,也弄不清楚他的昏乱和疲倦究竟为了什么。他没有意再往大学教课,于是请了假,带着夫人回到本乡去。<sup>④</sup>

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革命青年一样,残酷的现实打碎了董无垢的理想主义,曾经所信仰的价值与意义被颠覆,五卅运动中所唤醒的政治热情与革命理想“仿佛生了翅膀飞走得干干净净”,董无垢像是被急剧的时代与历史进程所抛弃的海上孤客,孤立无援地在四顾茫茫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他没有能力认清自身所经历的一切以超越时代的悲剧,仅仅只是逃避式地离开了大革命的中心地上海,带着夫人回到本乡去。从激进的群众运动与政治生活回归纯粹的“个人生活”,返乡之后的董无垢几乎从革命与历史的进程中完全抽离,对现实漠不关心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像鲁迅笔下如苍蝇一般“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sup>⑤</sup>的新知识分子一样,董无垢“在自己和人群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sup>⑥</sup>,再次回到叶圣陶笔下新文化运动初期新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隔膜”处境。<sup>⑦</sup>

幻灭让董无垢陷入精神的虚空状态,而虚空则意味着新的思想观念进驻的可能,即小说中所言的“信仰本能”的发生。<sup>⑧</sup>董无垢有一个念佛的母亲,在理想幻灭的虚空与痛苦中,他每天早上看母亲做功课,老太太“平和而沉静的声调展开一个神异的境界,仿佛一张软和的眠床,叫他感觉舒服,几乎要入睡”,因“看看母亲的神色,那样安详,那样愉快”,他就开始陪着母亲做功课,渐渐地“忘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又似

①②③④⑥⑧ 叶圣陶著,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三卷,第393、395、396、397-398、398、384页,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⑤ 鲁迅:《在酒楼上》,《狂人日记》,第1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⑦ 关于叶圣陶小说“隔膜”命题的分析,参见顾颉刚:《〈隔膜〉序》,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13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乎捉住了一些什么”。<sup>①</sup>在这一因缘之下,又因屡次向一位有着很深的佛学根柢的父执请教修行的法门,董无垢逐渐在佛学中看到了希望的光辉,开始像母亲一样皈依佛教,戒烟,戒酒,戒荤,每日做功课,研究佛典。伴随这一转变,董无垢的知识信仰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他认为唯有佛学才“真把握了生命的精微”,西方哲学、心理学不过是浮泛的、虚无的、对于人毫无用处的研究,于是将曾经收集的富含“五四”思想启蒙色彩的恋爱小说、裸体画片连同霭里斯的《性心理学》等“付之一炬”。<sup>②</sup>可以说,佛学给了董无垢全新的价值体系与认知方式。

佛学作为一种心性之学,在宗教信仰的价值层面之外,同西方心理学一样,同样具有解决心理问题的精神疗愈功能。日常生活中的持戒与近于儒家修省功夫的“做功课”让董无垢的痛苦情绪转化为一种清净与修养的念头,使他日渐走出颓废空虚,“默默地念着那些辞句,他的心重又充实起来了。烦恼化成淡淡的影子,既而连淡淡的影子也消逝净尽,只感到无上的欢畅”。然而,面对个体的精神痛苦,佛学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精神治疗模型,相对西方心理学对于科学、理性精神的强调,其更多是一种解构能力,佛学的修养功夫以一种强大的解构能力,消解了董无垢难以承担的乌托邦幻灭的创伤,帮助其超越了亲人死亡的痛苦以及战争对个体与家庭的毁灭性打击。在佛法修为的加持下,面对母亲与夫人的相继过世,董无垢“不哭,也不露出一丝悲怆的脸色,还是平静地念着佛”。<sup>③</sup>

但是,同理想幻灭的创伤与个体人生痛苦一同被消解的是物质的欲望、世俗的参与以及主体的政治社会动能。信佛之后的董无垢不再有过从密切的朋友,即便没有接到大学的聘书以至于失业也不以为意,“报纸不过偶尔看看,好比看古代或是异国的故事,漠不关心”<sup>④</sup>。从革命时代激进的政治参与到对现实的漠不关心,他差不多和这个世界脱离了关系,完全抽离世俗人生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以“自我”的消亡与社会性死亡为代价,董无垢走出了幻灭,在宗教中获得精神与生命的再生,亲人离世的痛苦、失业的艰辛以及政治的幻灭等困局一并

得到克服,于是有了叶圣陶在小说开篇所刻画的颇为滑稽的“和尚”似的英文教授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一样蜷缩在大学的角落里。

除了民俗与生肖文化形象之外,老鼠向来是难得国人好感的动物,与其相关的成语也多为贬义。在小说中,虔诚持修、一心向佛的董无垢被叶圣陶比喻为蜷缩在大学地板下的老鼠,颇具讽刺意味。然而,在众多中国现代作家中,叶圣陶其实是比较有佛缘的,其虽不参佛法,自认为做不了宗教家,但对待佛教的态度却是极为尊重、恭敬与同情的。1921年,叶圣陶曾在好友丰子恺的引荐下,怀着虔诚的心情拜见过名满天下的弘一法师,<sup>⑤</sup>并先后写作《两法师》《弘一法师的书法》《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三篇文字,追慕其人格、艺术与宗教境界。在叶圣陶的笔下,弘一法师是一个以宗教情感与信念为支撑、戒律谨严、存在于人生内部的真正的宗教家。在《两法师》等文章中,叶圣陶对弘一法师的宗教人格极尽赞美,对其纯任自然的风度以及背后由内而发的严谨持戒和平和、宁静、从容的自我状态充满敬佩之情,他认为弘一法师以宗教家特有的生活法“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之内”,达到了其临终偈语中所说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sup>⑥</sup>

此外,叶圣陶对弘一法师的书法也极尽赞美,认为弘一法师的书法一如其人格,不卑不亢,和颜悦色,从容论道,天真、原始与成熟相结合,似乎温良谦恭的君子,近于晋人,蕴藉有味,其谨严持戒的宗教实践背后是近于艺术的精神能动性,蕴含着艺术独创的新生命。可以说,叶圣陶是怀着宗教与艺术的双重眼光,将弘一法师定位为完成了心灵净化与内心超越、创造了全新自我与艺术新生命的佛学大师、艺术大师。相较而言,同样信佛的董无垢却被叶圣陶塑造为颇为滑稽的“和尚”似的英文教授,像个迷信

①②③④ 叶圣陶著,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三卷,第398、399、401、401页,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⑤ 弘一法师,即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丰子恺曾是其在浙江一师任教时的学生。

⑥ 圣陶:《两法师》,《民铎》1921年第9卷第1号。

的老太婆,如地板底下的老鼠一样蜷伏在大学的角落里。显然,在叶圣陶看来,董无垢的宗教人格和境界与弘一法师相距甚远。相比于真正宗教家通过宗教所获得的心灵净化与内在超越以及内在近于艺术的精神能动性,董无垢对于佛教的皈依更像是对于宗教的一种窄化,更多的是理想幻灭后的精神麻醉与自我逃避,佛学的修养功夫在消解其精神痛苦的同时,也从根基上消解了其内在精神动能。他将主体的根基建立于宗教的“极乐国土”,彻底丧失政治社会动能地存在于虚幻世界之中。

### 三、董无垢与倪焕之的时代悲剧

对于董无垢等新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时期所遭遇的时代悲剧,叶圣陶在创作于1928年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已经有所触及。青年倪焕之经历了与董无垢相近的时代悲剧,小说《倪焕之》的后半部分集中叙述了倪焕之投身群众运动,经历“五卅”,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幻灭、死亡的历程。由倪焕之身处革命中的主体状态来看,和董无垢一样,他同样是一个纯粹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因为从根本上认同“革命”,倪焕之的主体与时代同构,几乎是以完全“忘我”的方式参与时代与历史进程的。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激励下,倪焕之同样天真地以为革命胜利的远景近在眼前,最终因“大革命”的失败与导师王乐山的死而信念崩塌、精神崩溃。面对同样的时代困局,与董无垢的命运稍有不同的是,叶圣陶最终以一场名为“肠室扶斯”<sup>①</sup>的疾病结束了倪焕之的生命。

然而,倘若细加比较,对于自身笔下人物相近的个体命运与时代悲剧,叶圣陶对二者内在的情感态度有着细微的不同。对于身处革命高潮中的倪焕之与董无垢,叶圣陶同样刻画了他们在从“我”到“我们”的主体变迁中,沉浸于个体的阶级界限被打破、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的主体状态。但是,对于“大革命”中的倪焕之,叶圣陶则着重描写了其主体的内在自省与改变。相较董无垢,倪焕之的个体觉悟显然更进一步,他已经意识到革命动能的“内发”问题,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民众”的关系。在倪焕之看来,革

命的发动力在于生活本身、在于“民众”的内部,那些“青布短服”的朋友“心里以至每一个细胞里的能动的的原因”才是革命的真正动能所在。<sup>②</sup>因此,知识分子应该修正自身的启蒙者姿态,向“民众”学习,成为“民众”中的一员,学习用“民众”的眼光看世界,“学习他们那种朴实,那种劲健,那种不待多说而用行动来表现的活力”。<sup>③</sup>

而且,相较于董无垢滑稽形象的反讽,叶圣陶对于倪焕之的悲剧命运则充满悲愤与同情。在叶圣陶的笔下,倪焕之的情绪在酗酒之后的亢奋、遗忘与清醒之后面对残酷现实的痛苦、恐惧之间起伏动荡:在酒精带来的精神亢奋中,“他笑了,近乎浮肿的红脸上现出孩子一般纯真的神采,好像一点儿不曾尝过变幻的世味似的”<sup>④</sup>。然而,当放下空杯的时候,倪焕之脸上的纯真色彩消失,只剩下精神崩坏后的哭泣。对于倪焕之的哭泣,小说中这样写道:“哭了开头反而什么都不想,只觉得现在这境界就是最合适最痛快的境界,哭呀,哭呀,直哭到永劫的尽头,那最好。他猝倒似地靠身在墙上,眼泪陆续地淌,倒垂下来的蓬乱的头发完全掩盖了眉额,哭声是质直的长号。”<sup>⑤</sup>将一个纯粹理想主义者精神崩溃幻灭之后的哭声描述为“质直的长号”,犹如魏晋名士阮籍的“穷途之哭”一样触动人心。

在叶圣陶的笔下,无论倪焕之的幻灭、崩溃、酗酒与哭泣,还是脆弱、暴病与死亡都是纯粹的,是一个纯粹理想主义者精神幻灭之后的崩溃与颓废。而对于董无垢历经幻灭后从外在形象到内在主体状态的改变,叶圣陶虽同情其人生悲剧,但笔调间始终难掩讽刺与批判的意味。究其根源,内中所折射的或许是叶圣陶对当时不同类型的新知识青年在内在态度上的细微差异。因为,倪焕之与董无垢虽然同属于五四时期的新知识阶层,在大革命时期经历了相近的时代困局,但从起点来看,二者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倪焕之虽接受新式教育与新思想的影响,但其成长于五四时期的乡土社会,受新村式社会改造思潮的影响,热衷于乡村教育革新实验,在投身于大革命之前,他更像

①②③④⑤ 叶圣陶:《倪焕之》第2版,第235、186、189、232、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是一个以乡土为本位的社会改革者。董无垢则是“五四”前后从美国留学归来、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都更为“无根”的西化知识精英,无论对最初的教学工作,还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都持单纯的理想主义,以至于面对大革命的失败,连自身的专业信仰都不加反思地放弃。革命理想主义的幻灭同时触发他对西方现代知识与文化的幻灭,从而使他落入彻底的虚无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同为“五四”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面对历史与时代的困局,董无垢似乎在佛学信仰中求得“新生”,但实际上,“西化”与“无根”的董无垢的主体性比倪焕之更为脆弱。

相对倪焕之的死亡,叶圣陶虽然借助佛学信仰让董无垢走出了理想幻灭的崩溃处境,但是,佛学的修养功夫在帮助董无垢克服幻灭的同时也消解了其身上的政治社会动能。可以说,以个体的消亡与社会性死亡为代价,董无垢走出了革命乌托邦的幻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董无垢而言,宗教所带来的仅仅只是理想幻灭之后的避难,而非精神与生命的再生。回到国民革命的历史,倪焕之与董无垢所面临的其实是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局。据史料记载,1928 年前后,从大革命失败中逃生的知识青年创造了五四时代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个“自杀时代”,正如苏雪林所言,叶圣陶以死亡处理倪焕之的结局,“不过是当时这类故事必然的收局”<sup>①</sup>。

## 结语

从“五四”到“五卅”,短短八九年的时间,叶圣陶短篇小说《英文教授》的主人公董无垢从一个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新知识精英,因革命乌托邦的幻灭转变为抽离时代与社会的佛教徒。同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相近,短篇小说《英文教授》所指涉的同样是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所遭遇的精神危机,隐含着叶圣陶对青年与时代困局的再思考。革命无疑是构筑倪焕之与董无垢人生悲剧的主因,“革命,像一柄双刃剑,在向前方的乌托邦迈进的时候,将所有伤

感的理想主义都践踏于脚下,只有那些无须小说家式的‘自我想象’的人,那些对空洞的‘同情’不屑一顾的人,才能享受革命”<sup>②</sup>。倪焕之与董无垢显然都是无法“享受”革命的人,他们既无法在国民革命失败的历史当下认清自身的处境,也无法像茅盾笔下的革命青年那样,“在政治悲剧中重新寻找和时代的进步关联”<sup>③</sup>。面对革命理想主义失败的困局,倪焕之精神崩溃,酗酒长号,暴毙死亡;董无垢通过皈依佛教似乎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超越,重新回归“宛如一道流动不息的小溪”<sup>④</sup>一样平静自足的生活。但是,欲望与生命能动性的消亡并未使其从根本上克服精神幻灭的危机,再生新的历史可能性,而是使其以个体政治社会能动性的消亡为代价,抽离时代与社会地“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sup>⑤</sup>。从本质上来看,二者都未能“超克”革命与青春的失败。然而,在《倪焕之》之后,叶圣陶通过短篇小说《英文教授》以更为细腻丰满的心理描写深入主人公精神结构的内部,清晰地呈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段历史时期知识群体内在主体状态的变迁及其所遭遇时代危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研究者对《倪焕之》后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血肉丰满、“流于空泛的疏说”的批判。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2024 QQJH192)资助。】

【作者简介】李培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与新文学。

- ① 苏雪林:《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节录)》,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 153 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 ②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第 120 页,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③ 王璞:《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读宋明炜〈少年中国〉》,《读书》2017 年第 10 期。
- ④⑤ 叶圣陶著,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三卷,第 401、402 页,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